

■ 学人素描

# 黄勇：洞察《反垄断法》的中国意义



◎ 刘晓阳

8月30日,在西方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获得高票通过。《反垄断法》可谓是一部命运多舛的法律,从起草到审议,历经十三载,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而转型期的政经生态,国资的固若金汤,外资的强势进入,民营的不安现状,垄断行业的分配失控,普通民众的维权希望,各方角力博弈不断上演,都在这部法律的立法进程中一览无余。这一天反垄断立法专家黄勇在兴奋之余进入了更冷静的思考。

## 深刻认识反垄断法的“中国”意义

黄勇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经济法、竞争法等领域的教学研究,讲授《经济法》、《竞争法》、《宏观调控法》等课程。曾参与《破产法》、《对外贸易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立法草案或法律的修改工作。2005年2月,黄勇被聘为反垄断法立法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从此开始参加《反垄断法》的制定工作。《反垄断法》出台以后,黄勇教授成为众多媒体采访的对象,立法与普及教育需求陡然上升,黄勇教授也从反垄断法立法的后台走到了前台。

要说黄勇与反垄断法的不解之缘,还得从他在美国进修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黄勇赴美进修。在那里,他对美国的托拉斯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我们对于诸如像托拉斯法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宪法”、“企业大宪章”这样的字眼极为陌生,但黄勇却敏锐地感觉到反垄断法既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大法,在中国将会有其重要地位,又是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法律。带着这样的信念回到国内,黄勇从此也把个人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反垄断法的研究上。

作为我国著名法学家沈达明和马大同先生的弟子,承传大家学者风范,黄勇潜心研究学问,期望走一条自己的研究道路,倡导学术研究的社会实用性。他认为,做学问的人应当把握好

人们希望《反垄断法》“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我国市场经济的诸多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反垄断法立法专家组成员黄勇教授对此却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学科发展方向和市场所需方向,并要有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用他的话来表述就是,本科阶段能在北京大学学习,带给他严谨的学习习惯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他又养成了直面社会的务实态度。两者的结合,促使他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参与国家的立法活动,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给社会,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6年,一篇《反“垄断”是全盘私有化的险恶圈套》在网上传播,这是黄勇第一次看到如此彻底反对《反垄断法》的声音。“太耸人听闻了!”《反垄断法》可以说是各方利益在法律层面的博弈。而且越到起草后期,各方利益博弈越尖锐。这是他作为立法成员第一次感受到在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艰难,他认为“这和我们经济体制转变和社会需求有很大关系。”

从《反垄断法》的主体内容来看,其基本理念和内容结构,与当前先进的国际竞争法律接轨,通过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三类主要垄断行为的规制,构建了反垄断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然而,在法律起草过程中,黄勇和其他专家还要更多地考虑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阶段。“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现阶段中国反垄断法的任务,还是要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中国反垄断法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维护竞争,还必须创造竞争。法律中规定的垄断协议豁免、行政垄断、行业协会垄断行为等法律责任问题等都很强烈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管社会上对于我们国家的《反垄断法》出台如何评价,但黄勇坚持认为:这只是个阶段性成果,这是与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相吻合,也是与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 为国家利益尽责是知识分子的义务

学者的社会责任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社会重大事件的参与程度,黄勇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积极投身反垄断立法工作,虽然忙碌但很充实。正是他的这种“静心”,反垄断法磨蹭十几年的他也“着迷”其间十几年。黄勇作为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受聘担任国务院、全国人大法工委“反垄断立法”专家组成员,开始参与法律的制定。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专家们经常因为一个措辞、一个条文的表述反复推敲。但他认为,作为一部酝酿了十余年的重要法律的出台,这

种严肃认真的精神是必须的!与此同时,黄勇教授在十多年里除参与法律的制定以外,还力主撰写或参与编写《国际竞争法研究——竞争法实施中的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和《中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典案例评析》等专著,它们都成为我们了解国际反垄断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国内,价格联盟的身影屡见不鲜,比如民航机票价格联盟、电脑软件价格联盟等。在《反垄断法》出台前一个月,方便面事件曝光了。“防止行业协会成为垄断行为的推手和组织者”,成为立法小组和本次人大常委会的讨论焦点。黄勇认为,“方便面行业协会如此堂而皇之地进行价格协调与串通,暴露了他们对竞争理念的无知和法制意识的薄弱。竞争者之间的联合定价,在各个国家都是反垄断法首先打击的对象。此外还有共谋分配产量和数量、划分销售或服务市场等。类似方便面企业这样的价格联盟,除了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外,不应当在现实中重演。”

谈到近来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反垄断法》引起了一些国有垄断型企业的不安,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反垄断法要保护规模经济,保持国际竞争力,应该给“国家队”更多的豁免权和宽松的条件。黄勇却觉得这种“豁免”要求很不合理,“就反垄断法而言,反的不是大企业,更不是反规模经济,而是反对大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力,从事排除竞争、限制竞争,进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如果政府对某些行业采取管制或者部分管制,反垄断法必然在这个行业领域不起作用,或者只起很小的作用,这会严重的限制竞争。企业并不是行政机关,而是市场中的经营主体,即使国家给予它们特殊地位,它们也不能滥用这种地位。在全球化时代,即使它们在国内不受挑战,也会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对它们实行保护并不是最好的模式。”

作为关注研究反垄断问题的专家,黄勇也一直关注沸沸扬扬的外资并购案所引发的很多国人的忧虑:多年苦心栽培的“龙头企业”难道就这样被“狼”叼走,姓“外”了?有人说《反垄断法》通过,主要是对“外资并购”的限制和审查。面对公众的不解和疑惑,黄勇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者来华投资或进行贸易,有的确实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竞争秩序,有的甚至已经有了限制、排斥竞争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反垄断法》出台后,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贸易、并购等行为,也要遵循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竞争规则。和以往不同的是,《反垄断法》按照效果原则

可以实行域外管辖。这不仅仅涉及到外资并购中国的企业,境外的大型企业并购时,只要对中国市场有影响,达到《反垄断法》审查申报的门槛,就需要向中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申报。

黄勇表示,这体现了国家立法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但《反垄断法》作为国家竞争政策的体现,不应赋予其太多任务,反垄断法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 一个学者的建树

相比已经形成的法律条文,《反垄断法》的实施问题,更为人们关心。“现在的反垄断立法是比较原则和粗线条的,其操作性还有待改进。未来需要很多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黄勇说。

目前的反垄断法对垄断国企的竞争监管管辖权、反垄断法和其他各种行业监管法的关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果让行业监管机构依照行业监管法——比如像电力法、铁路法,还有未来的电信法、邮政法等来监管,几乎等于把反垄断法给肢解了。理想的模式,就是竞争监管部门作为主导,竞争法律和政策要优先于其他的行业政策。但是,目前恐怕不现实。最后可行的模式可能就是,竞争监管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都可以。谁优先的问题要讨论,最终是一种协商模式。”

这种监管规则的不明晰,还反映在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上。“从目前看,还不清楚反垄断委员会之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一个还是多个,再加上数量众多的行业监管机构,关系非常复杂。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模式还是统一、独立、专业和权威的,不然会导致权限不清,耗费行政资源,增加企业的负担,令企业无所适从。”

反垄断法现在最大的问题,无疑是执行力问题,这也是人们从法律起草之日起就担忧和争论的地方。如何把法律条文的规定,在执行机制中做实,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将是黄勇(包括其研究团队)和其他专家所面临的一个长期课题。

反垄断法将会在执行中接受实践的考验,黄勇教授表示,他会一如既往地率领自己的团队继续为这部重要法律的完善努力工作。作为学者的黄勇似乎看得更远,他认为要保持学术研究方面领先地位,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梯队及在制度上保证梯队的延续性。同时,学科的发展又是综合性的理论和知识的结合,单靠法学一门学科是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只有具备了跨学科的管理和知识的结合,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比如,反垄断法就很重视经济学的作用,只有跨学科的融会贯通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研究成果的质量。

这是一个学者的心声,也显示了一个中年学者甘为人梯的品格。

## 本期人物话语



## 国际投资者关注在华五大发展机遇

吴仪(国务院副总理)9月8日在厦门举行的“2007国际投资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建议国际投资者特别关注在华的五大发展机遇:一是扩大现代服务业合作;二是加强节能环保和城镇建设方面的合作;三是积极参与中国区域开发和建设;四是开展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五是探讨共同开展国际投资合作的新方式。

## ■ 多声道

## 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潜力巨大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于9月6日在厦门举行的“2007中国私募股权基金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表示,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发展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能够减少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开展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家运用私募股权基金整合国内产业,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因为,私募股权基金主要投资于未上市企业的股权,私募股权基金在企业早期、成长和扩展期都能发挥较大推动作用,更有利于整合企业资源,培育企业成长性,提升企业价值。另外,发展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正是给中国企业家进行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提供新的更有效的金融工具。

## 美国经济的威胁

斯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9月7日在达沃斯夏季论坛中表示,美国GDP目前过于依赖消费,而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是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因为,目前美国GDP72%来自于消费需求,这不是由收入支撑的,美国财富主要来自于资产升值。但是,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美国的消费者现在“两面被火烤”。美国人一直相信可以不存钱保持发展。现在可以看到,美国人已经把自家的家变成一个个取款机,卡已经被收走了。

## 医改方案不久将公布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9月7日在达沃斯大连新领军论坛的“超越制造业”论坛上表示,关于深化医疗改革的方案正在研究当中,不久的将来会向社会公布。目前,已对相关几套医疗改革方案新达成共识。医疗保健业要健康发展,应该是政府与社会共同投入。政府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基本医疗保健,同时动员各种社会资源进入医疗行业。这样既可兼顾基本医疗需求,又可满足多种医疗需求。

## 央企要加快重组整合加快整体上市

李伟(国资委副主任)近日在“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暨大企业高峰论坛”上表示,在央企重组过程中,不仅是做大,更重要的是做强做优。而且,还要利用资本市场推进中央企业改革重组。做强做优的路径之一,是加大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工作力度。国资委已经研究制订了《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央企业调整的目标和方向以及国有资本集中的领域。联合兼并、改制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多种形式将成为央企新一轮调整的方式,将以出资人为主导,进行中央企业的调整重组。在央企重组中,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有望日益突出。除加大中央企业之间调整和重组的力度外,我们还将开展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合作,通过以资本为纽带、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发挥区位优势、技术、资金、资源等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和企业联合。

## ■ 经济学问家故事

## 沈志远在生活书店

◎ 梁捷

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能接触到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书籍,数量还是非常有限。做一下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就可以知道,十九世纪中期,京师同文馆出版过《富国策》,但那只是作为内部教材,发行数量极少。1902年,严复翻译斯密《原富》(即《国富论》)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馆出版,影响稍广,这才使得中国人大概窥见现代经济学的面貌。但是与其他科学、文学等知识引介相比,经济学的位置还是很边缘。

根据已故的经济思想史权威胡寄窗教授的统计,1920年至1921年之间,中国只出版了16种经济学相关书籍;1921年至1922年,出版了22种;1923年至1924年,则出版24种。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这个数字不断增加,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抗战爆发后回落。总的来看,一直算到1949年,我国解放前出版的经济类书籍,包括国人编撰和翻译,总数约2000余种。

作为参照,我去查了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06年中国新闻出版基本情况”。去年国内总共出版经济类书籍19783种,其中初版12930种,数量是13418万册,也就是说,每十个人能分到一本经济类书籍,不到百年,经济学类书籍的增长速度竟接近十倍。

现在几乎每个出版商都在出经济类书籍,但质量良莠不齐。回头看,上世纪七、八十年前已是如此,那时竞争简直比现在还要残酷。出版社也是沉浮起落,罕有长盛不衰的。就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里,根据胡寄窗教授做的统计,二十年代后期的经济学书籍出版数量明显增长。1929年至1930年间,出版数量是前一年的三倍。而我所熟悉的一些民国时期经济学名著,多半是那个时期与读者见面的,那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与国际学术前沿最接近的时代。

今年正是三联书店前身之一的生活书店成立75周年,刚出版的《生活书店史稿》记录下生活书店一段光荣历史,而且附录生活书店出版的全部书目,给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经济学出版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生活书店1932年在上海成立,邹韬奋主持。抗战爆发以后,它西迁汉口,在各地设立分店,并于1948年将我国香港地区的读书、新知两家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文学和思想性的著作,如郑振铎、茅盾、艾青、臧克家等人的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并不是它的重点。但细细数来,它在短短十几年里,也先后出版了政治经济学25种,中国经济44种,外国经济11种,国际经济8种,总数90余种,达到一定的规模。

而且,生活书店出版经济类书籍的方向与其他出版社不同,不重学术经典,也不重海归名家,但重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重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传播西方思想根据地,他们往往找名家翻译西方经典,找著名学者写“万有文库”,虽然选题可能并不是最新,但能保证书本本身足够经典。其他如泰东书局、光华书局等,风格不同,也都各有一批联系紧密的作者。与他们相比,生活书店创办历史不算长,但它的社会科学类图书的特点很突出,即社会主义倾向,在它那么多经济学作者里面,沈志远先生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沈志远生于1902年,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后来受组织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沈志远考取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同时任共产党国际东方部书记翻译,并参加《列宁选集》第六卷的翻译出版工作,1931年回国。

沈志远与邹韬奋交往甚密,一开始就与生活书店联系密切,后来甚至还加入过生活书店的工作。他总共在生活书店出版了十余本书,包括《新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说史》、《研习资本论入门》、《近代经济学说史纲》等。此外他还旁涉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出版了《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翻译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其中《新经济学大纲》最负盛名,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版达18次之多。

19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真正在中国展开的阶段,陈豹隐等人刚刚开始翻译《资本论》。而沈志远这些留苏背景的学者则用通俗语言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那时也是社会巨变时期,“废两改元”,“统一法币”,但政治动荡,经济也非常混乱。知识分子都没有真正经历过现代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所以看到苏联那种井井有条的计划经济,非常向往。沈志远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成为30年代中国最热门的思想潮流之一。

除了沈志远以外,生活书店经济类作者还包括有彭迪先、杨培新、王亚南、许涤新、骆耕漠等,都是有成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如王亚南是民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译著者,不但重新翻译了斯密、李嘉图的大量著作,还与郭大力一同译完了三卷本《资本论》,而他的代表性专著《中国经济原理》也在生活书店出版。

这些作者1949年后都成了国内最著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学院和政府部门里担任要职。生活书店则变成了三联书店,从香港迁回内地,转变为国内极有特色的大型出版社。所以以上这些作者的书也获得了充分的重视,多次再版。

## ■ 慕尼黑随笔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改革,中国准备好了吗?

◎ 梁雨霏

在国际金融世界里,欧美互为“托儿”,瓜分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把交椅。在名义上,“世界银行”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以及资助发展而设立的,但实际上并不给了解问题的穷国代表做主的机会,一直由美国人霸占着总裁的位子;作为交换,美国人则总是支持欧洲人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儿。

在德裔法国犹太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被欧盟提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任主席的人选时,血气方刚的大国总统普京突然“作梗”,提名捷克央行原行长为候选人,并顺带把斯特劳斯卡恩的能力贬低了一通。

普京之外,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甚至对欧盟认同感不强的英国,也有话要说。为此,欧盟财长容克不得不宣布说,斯特劳斯卡恩将是最后一个欧洲人,在其五年的任期之后,保证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担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把手——但有一个条件,发展中国家必须在11月份的选举中,赞成斯特劳斯卡恩担任下一届的主席。

容克的战略退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多少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信号,但他的意志能否成为欧盟的主流,恐怕还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是否能胜任新的角色。

为了证明不是缓兵之计或者空头支票,容克语带双关地提醒,发展中国家接棒的事情,不应在斯特劳斯卡恩将任期结束之后才考虑,那个时候就已经太迟了,应该现在就开始准备。

容克的提醒,不仅是表达了欧盟的立场,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间接建议。正如容克所说的,是准备局部的权力交接。

普京敢觊觎的宝座,中国是否也敢染指?

中国就需要好好考虑下一步的事情了。五年后,出于种种原因,欧盟可能真的会支持中国人当选该职位——不管是因为中国展示了能力,

还是为了孤立中国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眼红,届时,中国是否敢接过这一棒呢?

我们的困难,在于如何应对国际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呢?作为大国,没有哪个积极对外扩张经济和生存空间的西方强国会对中国视而不见;对比之下,中国因为大,又因为封闭太久,眼光多局限于国内的问题。

好在这些年来,中国一直比较稳定,世界格局也相对平衡,西方有头脑的政治家,不得不一点点开始正视中国的存在与发展。

如此,即使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国际组织内的更多角色,我们又怎样才能利用好这些机会呢?

要得作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又要让竞争者们欣赏,以便牢牢站住脚跟,绝非易事,不懂经济,没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个人魅力,是做不到的。

期待中国能早日重视这些问题,以便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履行大国的权利和义务。所谓的“大国崛起”,不是喊几句徒然招人戒备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起来准备。